

马思猛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金石夢故宮情

我心中的爷爷马衡

王世襄敬題



# 金石梦 故宫情

我心中的爷爷马衡

曾祖父因祸得福改换门庭

幼年从师叶浩吾

官商联姻娃娃亲

南洋公学中途辍学

昌硕题书将斋

泥不染一将斋

初出茅庐

中国近代考古学前驱

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广交学人同道只论学术不分政见

结交厂肆碑估掌握文物信息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马思猛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13-3975-4

I. 金… II. 马… III. 马衡(1881~1955)—生平事迹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586 号

金石梦 故宫情——我心中的爷爷马衡

著者 马思猛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8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013-3975-4

定价 35.00 元



# 代序

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

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

## 序

马衡先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的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

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严谨，其为人人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严谨，其为人人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严谨，其为人人

郭沫若为《凡将斋金石丛稿》所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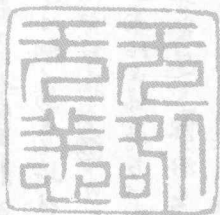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维护，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谨严；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

马先生复能诗，善书，工篆刻。一九三九年同寓重庆，曾以青田石为我治印一枚，边款刻“无咎”二字。今以钐于文末，以见一斑。

凡德业之以盖人者，人不能忘之。马先生虽颇自谦，然其所成就，已应归于不朽。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五日 郭沫若





##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纪念马衡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郑欣淼

2005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也是马衡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马衡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服务了二十七年，其中十九年担任院长之职。这十九年中，又多值战争年代，烽烟遍地，故宫文物南迁、西运，以及新旧政权的交替等。马衡先生终生以保护故宫文物为职志，他为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永载青史。他又是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大师，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引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乃人生之“三不朽”，人生在世求之其一已属不易，而马衡先生在德行、功业、著书立说三个方面都有所“立”，都令我们永远感念。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又一胜利，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上更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马衡先生积极参加了博物馆的肇建工作，为捍卫和保存这个新生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他担任古物馆负责人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1924年9月，爱国将领冯玉祥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为

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临时执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煜瀛为委员长,决定延揽学者专家,点查古物,筹办博物院,以学术公开张本。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的马衡先生,被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为顾问,参加点查清宫物品工作。1924年12月23日上午,清室善后委员会顶着段祺瑞执政府要求停止点查的命令而执行乾清宫点查,这是该会第一次实施故宫文物清理。档案中保存的这一天的点查组名单中,马衡先生赫然在列,而后他几乎天天到会入组。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成立,业务部门分古物、图书两馆,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与张继任副馆长。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第一任理事会设理事九人,李煜瀛为理事长,马衡与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沈兼士、袁同礼等为理事。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扰,时局动荡,加上经费的困绌,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保存故宫博物院,包括马衡在内的院内外进步人士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努力。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成功,南京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氏“为国务所羁,不能亲来”,便电派在北平的马衡、沈兼士、俞同奎、肖瑜、吴瀛五人为代表,接管了故宫博物院。

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故宫博物院,渴望各项工作走向正常发展,国府委员经亨颐却认为故宫文物为逆产,提出了“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而国民政府竟通过了经的这一荒唐提案。故宫博物院的同仁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和气愤,决定分头筹划对策。北平方面,



由代表易培基接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等五人于7月8日拟写了传单,将故宫博物院创建经过、建院的必要性及经亨颐提案之不当等情况陈述于国人面前,并于7月9日借招待北平及各地来平的军政要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邵力子、李济深、吴稚晖、张群等到院参观之机,将传单发给他们,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传单中说:“无论故宫文物为我国数千年历史所遗,万不能与逆产等量齐观。万一所议实行,则我国数千年文物,不散于军阀横恣之手,而丧于我国民政府光复故物之后,不幸使反动分子、清室余孽、当时横加非议者,今乃振振有词;同仁等声誉辛苦,固不足惜,我国民政府其何以自解于天下后世?拟请讯电主持,保全故宫博物院原案,不胜万幸!”在南京的张继呈文批驳经的谬论,易培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坚持建立故宫博物院的必要性。经过共同努力,经的提案遂被否决,决定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原决议案。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业务部门为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易兼任古物馆馆长,马衡任副馆长。国民政府公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组织条例》,理事会为院中事务最高监督机构,并任命了第一届三十七名包括党、政、军、文化、宗教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理事会理事,马衡名列其中。

由此可见,在马衡先生接任院长之前,就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中坚,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院务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数年间,他具体负责的古物馆工作,更是有声有色。古物馆虽先后俱是易培基任馆长,1927年11月江庸也任过馆长,但主要担子还是落在马衡的身上。古物馆实际上是宫廷珍宝库,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惊人。马衡先生对古物馆



内机构的设置、业务的划分都有周密的考虑。依文物性质,馆内又设立了书画(书画碑帖)、金石(铜器、玉器、石器等各种文具)、陶瓷(瓷器、珐琅器、玻璃料器等)、织绣(织绣品及其材料)、雕嵌(雕刻或雕嵌之牙骨竹木漆等器)、杂品等六个部,主要业务为登录、编撰、流传、展览、典藏、装潢等方面。马衡又亲自拟写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办事细则》,对本馆九课分掌事务作了详细规定。古物馆同仁积极布置陈列展览及进行文物整理、传拓、刊印等工作,成绩显著,后又装箱南运文物,尽职尽责。马衡先生在其中不仅发挥了其熟悉古物的优势,而且展现了善于组织管理的卓越才能和细致、缜密、务实的工作作风。

1. 陈列展览。在各界人士捐资支持下,古物馆在内东路、内西路各宫次第成立各专门陈列室,1932年已达二十六处。其中主要有:钟粹宫前殿的“宋元明书画专门陈列”,后殿的“扇画、成扇专门陈列”;景阳宫前后殿的“宋元明瓷器专门陈列”;承乾宫的“清瓷专门陈列”;景仁宫前殿的“古铜器专门陈列”;斋宫前殿的“玉器专门陈列”;咸福宫的“乾隆珍赏物陈列”等等。此外,还保持、充实和改善建院初期在中路乾清门至坤宁门四周廊庑开辟的象牙、玛瑙、珐琅、景泰蓝、雕漆、如意、文具等工艺美术类文物的专题专项陈列,这些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 古物的继续清点和整理。这是故宫博物院当时的一项重要业务的工作。对于点查完竣的宫殿与文物,除有历史意义的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外,凡与朝廷典制无关或不甚重要的配殿,均予整理装修,辟为文物陈列室。原贮放其间的文物,则进行集中,再分类整理。古物馆的工作量最大。例如提取乾



清宫瓷铜玉器、慈宁宫牙骨器、斋宫等处书画、养心殿珐琅器、端凝殿古月轩瓷器等到古物馆，分类登记、整理，移送库房收贮。同时还开始了文物审查与鉴定工作，聘请专家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从事鉴定，主要鉴别文物名称与材质、考订文物时代、判别文物真伪。古物馆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委员会，马衡亲自主持铜器审查。这是对院藏文物的第一次审查鉴定，也是文物保管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开端。经过审查鉴定的文物，虽只有一小部分，但贡献是很大的，后来文物南迁，运走的主要是当时审定过的精品。为了保护文物，古物馆 1931 年设立了裱画室，对受损的书画进行修裱抢救，并制定了二十条《书画装裱规则》，对损坏的存放文物的木座、木匣，也先后雇用工匠来院修理或修补。这些扎扎实实的工作，为文物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古物的传拓刊印。古物馆创立之初便设立了流传课，制订了一套较完备的传拓各种铜器的细则和钤拓古印的规则，对于物品的提送保管、材料纸墨的收发注销、拓工工作的监视以及出品拓片的印鉴登记等一切手续，都有严格的规定。凡是经过审定有价值的古器物文字，均付传拓，以资研究流传。从 1929 年到 1932 年，传拓达上百种，包括散氏盘、嘉量及宗周钟等。还把藏有秦汉铜印一千余方的“金薤留珍”钤成印谱出售，由马衡等四人负责钤盖工作。为了刊印书画铜瓷等古物，古物馆 1928 年初就创设照相室，改建玻璃室、暗室，为古器物摄影，出版了多种专辑图录。仅《故宫书画集》就出了四十七期。这些古器物的传拓刊印，不仅使宫廷珍宝更多地为世人所了解，同时对解决博物院的经费困难作了一定的贡献。

4. 古物馆重要文物装箱南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鉴于时局不断恶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决定，并报国民政府同意，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装箱难度大不相同，最难的是古物馆，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损，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极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硬，可是一碰就碎；其他脆弱微细之物尚多，装时各有困难。在马衡先生领导下，古物馆的同仁积极想办法，虚心学习求教，终于一一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包装质量，并按时完成了任务。集中装箱的以书画、铜器、瓷器、玉器为主，数量也最多，同时装箱的象牙、雕刻、珐琅、漆器、文具、陈设等工艺类文物，也占相当数量，共计二千六百三十一箱，六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件，其中仅瓷器就达一千七百四十六箱，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件。对石鼓的装运，更是渗透了马衡先生的心血。石鼓是人人都知道的国宝，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十个石鼓，每个重约一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有不慎，石皮就会剥落下来。马衡先生负责石鼓的迁运，并认真研究装运的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记了这件事：“余鉴于此种情状，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纵使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梟纆（xǐgěng，麻绳），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发现新的伤损。第二批迁运由马衡先生押运。

马衡先生 1933 年 7 月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次年 4 月实授院长。他是因易培基院长被诬盗宝而被迫辞职后上任



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令社会关注并为一些人所觊觎的职务。但等待马衡先生的却是沉重的担子。此时文物南迁基本告一段落,文物的整理、存储为首要任务;八年抗战中,南迁文物又在西南后方辗转疏散,备受艰难。从1933年后半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十二年中,马衡先生带领故宫同仁,在社会有关方面有力支持下,为保护文物安全竭尽心力,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对故宫博物院留平文物的清点及南迁运沪文物的点收,是马衡就任代理院长后所着重抓的一项工作。1934年1月行政院就做出了这项决定,由于亲自参加并深入了解故宫博物院十年来文物的清理及保管状况,马衡先生对这一基础性建设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正如他1934年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所说:“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譬之故家田产,略无统计,试询其子姓以田亩四至,率茫然不能置对,乃欲责其管理难矣”。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制订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各馆处科组分别制订了详细的办事细则;组成了“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开始对全院文物进行认真的分类、整理、编目,并办理文物审查。为协助文物审查工作,还颁布了《专门委员会设立章程》,成立了书画、陶瓷、铜器、艺术品、图书、史料、戏曲乐器以及宗教经像、法器、建筑物保存设计等委员会,由马衡院长聘任专家学者为委员,其中特约专门委员十三人,通信专门委员五十二人,都是各有关专业领域的翘楚。

运沪文物的点查,从1934年1月开始,1937年6月完

成。这些文物自北平装箱运出时,清册上只记了品名与件数,没有编造详细清册。这次点收则是按箱登记,核对检验,铜器、玉器、牙器,都要记明重量。瓷器,还要标明颜色、尺寸(包括口径、底径、腹围、深度等)、款式,有无损伤,巨细靡遗。点查同时,又按照马衡院长制定的“全材宏伟”、“沪上寓公”八字,分别重造三馆一处南迁文物的编号与箱号。点验过的文物全部钤盖上“教育部点验之章”。此外,又将每日点查结果汇集整理,定名为“存沪文物点收清册”,并油印装订,成为故宫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著录。

故宫本院留存文物的点查,于1935年7月全面开始,1936年10月结束。点查仍按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的规定为依据,仅登录品名及件数而没有详细登记,一是考虑文物数量大,来不及细查;二是考虑需要日后进一步对全部文物分类整理编目。因此只着重于首先点清留院文物品名、数量,其他工作留待以后再作。这次点查成果也颇丰,凡清室善后委员会于仓促中遗漏者,或载于清室旧目从未发现者,皆逐件检出,并予以补号登录。

与此同时,马衡院长亦为建立南迁文物的保存库呼吁努力。1935年4月,成立了由马衡院长及当时的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组成的“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推动设立南京分院。1936年3月,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8月完工。这座三层的钢骨水泥建筑,存放着从上海转迁的故宫文物。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马衡院长雄心勃勃,决心在此多干一些事:立即准备修葺朝天宫大成殿、崇圣殿等处,决定一一辟为陈列室,同时计划添置陈列柜,调节照明设备,定做文物储藏柜,进行藏品编目工作等等。但这些工作



没来得及进行,南京分院成立后历时仅半年,“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便奉命向西南后方疏散,或称“西迁”,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一迁又是八年。这八年中故宫同仁以储藏整理、保护文物完整为首务。尽管备受艰难,险象环生,有的工作人员还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人们无怨无悔,忠于职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自己所承担的神圣责任的深刻认识。正如马衡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马衡院长在这八年中策划调度,鞠躬尽瘁,功莫大焉。

南迁文物的西迁,是分三批进行。第一批西迁文物共八十箱,多是参加过在英国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文物中的精华。1937年8月由南京经汉口始迁长沙,后又转移贵阳、安顺,1944年12月迁到四川巴县,称为南路;第二批文物九千三百三十一箱(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文物精品),又分两次运出,从1937年11月开始,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县,这批文物因是沿长江而上到重庆的,所以又称为中路。第三批文物七千二百八十八箱,1937年11月开始,分三次运往陕西宝鸡,后又经汉中、成都,1939年6月全部运到四川峨眉县。由于这批文物是从南京向北经陇海路转运到陕西的,所以又称为北路。这批文物的第一次转运、押运人员为马院长的次公子马彦祥,因当时故宫人手不敷,临时请其协助。文物西迁后,随

同西迁文物到后方的工作人员，分散在各个文物存放处，负责文物的日常保管与维护工作。在重庆设立总办事处，由马衡院长率领一部分人驻守，进行统一调度与安排。

在文物疏散过程中，行政院只是提出文物储放的大致地区，具体地点则由马衡院长通过实地考察来选择、确定。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他即赴长沙视察，作出了在湖南大学后方岳麓山爱晚亭侧开凿山洞以存贮文物的决定。山洞按期凿成后，因形势骤变，又奉令将这批文物运往贵阳。运到贵阳的文物，开始在北门内租屋存储。后马衡院长亲往贵阳视察，觉得不够安全，最安全的是山洞，但凡山洞无有不潮湿的，费了七八天工夫，看了几十处山洞，才知道洞口轩敞的，潮湿程度比较好些。结果在安顺县南门外五里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外还有庙，有公路直达洞口，是比较理想的地方。便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内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第二批运往重庆的文物，末批尚未到达，行政院命令限期把存渝文物及正自北路运往成都的文物运出重庆与成都，另外觅地贮存。马衡院长即与押运文物来渝的院里同仁，到重庆以西各县寻找贮存地点。最后将存渝文物疏散到距乐山县城二十里的安谷乡，择定大佛寺及六姓宗祠为存储仓库。第三批文物从陕西宝鸡到汉中后，敌机轰炸汉中机场，为避空袭，保证文物安全，马衡院长亲自赶到成都，选定东门内大慈寺为仓库，把汉中文物迁存于此。后根据行政院把运到成都的文物运出的命令，又决定迁移峨眉县，存在县城西门外武庙及东门外大佛寺一带。1938年9月，马衡院长又同故宫理事李济先生赴汉中，调查文物迁运及保管状况。路途险阻，因桥梁断了，在广元就呆了好几天。正是这种切切实实，



不惮劳苦的作风,才使西迁文物找到了较好的存放地。

对于文物的妥善保管,马衡院长更是时刻注意,以求万无一失。这里仅以他在1944年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报告为例,可见当时的工作状况。他说:“本院战时业务首在保持文物之完整,举凡库房戒备、皮藏保管、翻检整理诸端,经逐年规划,时加改善,已臻周密,无虞疏失。对于工作之进度,尤无时不在讲求效绩。盖自“七七事变”以后,本院留用员额仅及战前之半,而事务之繁杂转重于昔,已非通力合作人尽其用,无以竟其事功。故一般从业人员担负工作已颇相当繁重,绝鲜冗散不力之病。近年又经设置专理人事机构考核课功,益加严密认真,同时厉行奖惩,鼓励自奋,竞求进步,效绩颇彰。”话似平常,但包含了马衡院长的多少苦辛。处境的艰苦是可以想见的,既有保管上的困难,又有经费上的不足。“特西迁物品,现皆散置川黔各库,为数极多,除陶磁铜玉以外,余皆楮素之质,霉蠹堪虞。西南气候郁蒸,鼠蚁之患尤甚他处,管理偶不经心,即有损毁之虑。必须经常不断检视翻晒,清理整治,始能策其完整。工作繁重不言可喻,且本院人员经费,早经大量紧缩削减,左支右绌,久苦不克,时有顾此失彼之虞”。据当时随文物西迁的那志良先生回忆,他在峨眉保管文物时,因薪水汇不回去,家在北平,生计成了问题,他便写信给马院长,要求回北平。马院长给那回了信,说无论如何不能去。马说他已写信回北平,叫张处长(张庭济,故宫总务处长)把他家里的东西,尽量出售,卖得钱,悉数给那家中使用,叫那安心做事。那说:“院长这样对我,我怎好执意回去!”

这是中国人民保护珍贵历史文物的壮举,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奇迹。1947年9月3日,马衡



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九千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惟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十二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七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对于马衡院长在抗日战争中保护文物的功绩,郭沫若先生有一段恰当的论述。他说:“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中国古代文物,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故宫所藏古物,即蒙多方运往西南地区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论,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但马先生从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故宫博物院文物存沪及安顺期间,还多次举办国内外文物展览,尽量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中外展览有两次。第一次是1935年,从存沪文物中选择铜器、书画、漆器、织绣、玉器、景泰蓝、家具、文具等各类文物七百三十五件,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历史文物也是故宫博物院文物首次出国展览。从1935年11月至次年5月,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出版了英文版展品目录及图录。皇家艺术学院又举办过二十多次有关中国艺术品的讲演会。参观